

# 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闫 恒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义和精髓。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全篇的核心主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化当中，内蕴着全面发展的理念和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理解这些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我们更好地从历史纵深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脉络，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将产生正面作用。

**关键词：**中华文化；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1-0011-0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义和精髓，也是解决“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依靠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问题的总开关。在我国固有文化与哲学思想中，重民爱民、养民教民的“民本”思想长期处于主流价值和指导地位，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sup>①</sup>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②</sup>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化当中，内蕴着全面发展的理念和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理解这些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我们更好地从历史纵深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脉络，

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将产生正面作用。

##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描述

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之下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提出了论述，指出当前我国人民大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是说，当前我国社会中人的需求开始逐渐摆脱马斯洛意义上较为低阶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开始走上安全需求(Safety needs)、仁爱和共同体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等较高阶的需求层次。<sup>③</sup>我国文化中也有类似表述，如孔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族士人群体与元代治道研究”(17XZX002)阶段性成果。

① 《党的十九大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② 《党的十九大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③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

对其弟子冉有讲的“庶矣、富之、教之”<sup>①</sup>的治国理念。在我国文化传统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想，那就是追求一个人人有尊严地生活、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为此，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不仅应当得到满足，道德文化、公平正义、安全稳定、环境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也应当得到满足。社会之中不应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均等，每个人必须的生活物资应该得到满足。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基本价值。

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尚书·洪范》提出了“五福”观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sup>②</sup>这就是说，人的发展不仅仅是满足物质财富指向的“富”，还包含了环境健康指向的“寿”、安全稳定指向的“康宁”、道德文化、公平正义指向的“攸好德”以及生存意义指向的“考终命”。孔子一生颠沛流离，“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学说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采纳，但其人格的全面发展却得到了历史评价的充分肯定，被视作顶天立地的圣人。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何尝不是如此。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之中全面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不是把人视为物质性的存在，而是点出人之根本属性在于道德文化等社会属性的要素。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脱离物质世界，去寻求所谓“属灵”的超验世界。而是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物质性要素。比如，管仲就认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sup>③</sup>孟子在阐发其治国理念时谈到：“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sup>④</sup>

在孟子看来，周文王能够取得天下，获得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养民，特别是关怀在当时作为弱势者的老年群体。而这篇论述中谈到的重点是温饱问题，对统治者提出了“无冻馁老者”的施政要求。在满足温饱，也即在物质性要素满足的基础之上，还要实现“富之教之”，用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和健全的道德观、价值观教化人民、提斯社会、凝聚共同体的向心力。

##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悠远的民本思想相承接。从民本发展的角度看，《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sup>⑤</sup>的观念。《尚书·大禹谟》谓“可爱非君？可畏非民？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sup>⑥</sup>指出君民协同一体的共同体属性。《诗经》提出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sup>⑦</sup>要求统治者以“民之秉彝”，也即人民之中普遍存在的常道理性为施政遵循。《周易·乾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sup>⑧</sup>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之中。人又与动物不同，他（她）为天所生，秉有天性，是“万物之灵”。按照各自的条件禀赋生存发展，即《周易·乾卦》所谓“各正性命”。天有好生之德，人亦皆有好生之德，<sup>⑨</sup>为了生存发展之需要，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培养出发展的心性和创造互惠共赢机制的能力，并经由历史的长期演进内化于文化基因之中。反过来作为共同体则必须保障每个

① 《论语·子路》。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③ 《管子·牧民》。

④ 《孟子·尽心上》。

⑤ 《尚书·五子之歌》。

⑥ 《尚书·大禹谟》。

⑦ 《诗经·大雅·烝民》。

⑧ 《周易·乾卦·彖》。

⑨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

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执政者作为共同体的表征，其核心任务就在保障民生的发展。因此儒家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社会共同体的意识，树立起发展为民的思维导向，一旦执政者脱离了这一思维导向，发展不能为民，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或军事力量强大，就会造成秦始皇、隋炀帝的执政悲剧。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期，统治者大多骄奢淫逸，彻底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中国传统论域中，人们还常用“共同体”来说明政治社会的起源。在柳宗元看来，周代选择封建制度的原因不是由于“圣人之意”，而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决定的。人们为了抵御风险，增加获得而导致了“群”的形成，一个个“群”（也即共同体）又组织成了较大的部落乃至国家政权。<sup>①</sup>

共同体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诗经》中记载了许多执政者昏庸无道，破坏共同体感的案例：“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sup>②</sup>

周幽王执政时期，使役不均，不平衡发展问题十分严重。谭国士人（即“东人”）勤于职役，劳苦不堪，京师士人却穿着华丽，逸豫有加。周朝世臣子孙（即“舟人”）以熊罴做衣服，尽享荣华富贵，谭人却只能遍尝百僚的艰辛。孔子认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sup>③</sup>孔子不担忧土地人民的稀少，不担忧发展总量较低，而更加担忧“不均”、“不安”，这体现出儒家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又对这段论述发挥有加：“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sup>④</sup>

董仲舒认为，不平衡发展如果过了头，必然导致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大富之人必骄纵，大贫之人必忧愤。忧愤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演化为对

执政者的不满，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骄纵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无视法律，胡作非为，这是人性人情的基本规律。所以贤明的执政者很早就能看到不安定因素从何处生起，而好的治理秩序一定要使富人能够有机会去显示他的富贵，但不至于骄纵；穷人一定要能温饱养生，这样也就不至于忧愤。用这样一种发展理念来调和发展的不平衡，既能实现国家财政用度不匮乏，又可以使得社会当中上下相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与孔子“患不均”的用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最大隐忧在于逐渐侵蚀人们普遍的共同体感，进而引发不同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处于极化状态之中的各群体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迅速流失，并且带来扩散化的效应，瓦解普遍的共同体认同。十八大以来触目惊心的“打虎”历程也表明，腐败不仅仅是腐败分子个人理想信念丧失的问题，其更加严重的危害在于客观上疏远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削弱了党和人民鱼水手足的共同体关系。因此，贤明的执政者必须意识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蕴藏的潜在危机，未雨绸缪，在切实增强人民对共同体的认同上下功夫。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湘西时首次做出了扶贫工作“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考察贵州时又进一步深化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里路，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性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由于中国社会东西差距大、城乡差距大、内地边疆差距大等长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总体条件，扶贫工作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文明的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① [唐]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据世界书局1935年本影印），卷三，论，第31—32页。

② 《诗经·小雅·大东》。

③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④ 《春秋繁露·度制》。

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发展理念的新思想，带有深邃的历史旨趣和文化用意。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凝聚起的强大国家能力的基础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的方式，对形形色色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予以一揽子解决的系统工程。其背后走过的恰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追求“天下为公”、民生幸福、“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政治理想和“家天下”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根本矛盾，和近代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财富增长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矛盾。我们看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擘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两对矛盾正在得到解决，中国文化追求人人有尊严的生活、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理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

### 三、习近平总书记的传统文化滋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无论是“五大发展理念”，抑或“三大攻坚战”，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通过道德伦理的涵化，最终实现人们心灵的安全幸福才是目的。中国文化中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从来就不是“给现钱、养懒汉”，而是孔子所表述的“富之、教之”，<sup>①</sup>也即在对困难群体给予一定帮扶实现温饱的基础上，通过“教之”使其获得谋生的信心与能力，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的整体面貌。西汉的名儒文翁在改变当时四川贫穷落后面貌时就采取了如下措施：

“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飭厉，遣诣

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笱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sup>②</sup>

我们认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如此看重文化问题，特别标举“文化自信”的深远意义。中华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因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在《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指出：“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sup>③</sup>

类似的表述也见于雷平生的访谈：“体现这种使命感的证据，我认为有两条：一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经过数年苦难和磨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直到现在，他仍一再提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习近平喜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从小我出发的‘物喜己悲’，转变为对群众利益的一种深沉忧患了。”<sup>④</sup>

从习近平总书记人生轨迹当中，能够深切地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融无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用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可谓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最高理想的表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① 《论语·子路》。

② 《汉书·循吏传》。

③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第64-65页。

④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①</sup>

大道流行之时，天下就属于全体人民。在这样的时代里，政治上就会建立起良好的选人用人制度，把那些有品德又有能力的人推选到领导岗位上；在社会风气上崇尚的是信义、和睦，不是用金钱或权力作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只是孝敬自己的老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而能够把爱心扩展开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民生保障方面，实现老年人有奉养、壮年人有工作，少年儿童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工作顺利，女人家庭美满。物质财富虽然归私人所有，但人人都有公心，会热衷于把物质财富拿出来奉献公益，而不是只为了自己囤积财富；剥削别人劳动是可耻的行为，但劳动者却也充满了奉献精神，并不是只想着靠用劳动为自己获取财富。这样的理想社会当中，阴谋诡计就用不着了，盗窃乱贼等不稳定因素基本消失，所以人们外出也不必关门，此之谓大同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个人依靠劳动生产出的物质财富首先还是属于自己，但是，既然人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劳动生产又必然依赖于社会的分工和协同，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国防、安全、医疗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所以又使得劳动者同意拿出部分财富或人力贡献给社会。进而生产劳动的意义也提升了，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共同体，为了邦国。因而，个体生产的财富是具有共享性的。这也是新发展理念当中，“共享”的思想渊源。

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有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有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但却缺乏实现这些理想的制度保证，因此也就脱不出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儒家思想所提出的

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正德利用厚生等一系列良好理念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无法落地，以至于宋代儒者朱熹激愤地评议说“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云：“专制政治的压歪，阻遏了儒家思想正常的发展”。<sup>②</sup>直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找到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才将尘封已久的儒家治国思想打开了通往现实的大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sup>③</sup>。”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接续了古已有之的重民爱民、教民为政的发展理念；作为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阳光大道，从根本上为实现中国古圣先贤提出的理想提供了制度保证。

#### 参考文献：

- [1] 党的十九大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 [2]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尚书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 [4] 徐复观.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 [M]. 台北：学生书局，1988.

作者：闫恒，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讲师

责任编辑：钟晓娟

① 《礼记·礼运》。

②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46页。

③ 《党的十九大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35页。